

西南小城寻古 叩问春申往事

孙全利

《史记》记载，春申君不听朱英言：“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但是此时的春申君或许是年龄大了，骄傲自负，哪里还听得进门客的谏言呢？于是春申君问道：“何为不期而至的福？”朱英答：“您居楚相之位十余载，虽名系宰相，实则权倾朝野，形同楚王。现在楚王病重，死在旦夕，您辅佐年幼的国君，因而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再把大权交给他，不就是您南面称王而据有楚国？这就是不期而至的福。”春申君又问道：“何为不期而至的祸呢？”朱英回答：“李园虽不掌国政，实则视您为仇敌，他素不涉兵事，却暗中养刺客日久，楚王一旦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要杀掉您灭口。这就是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接着问道：“谁又是

不期而至的人呢？”朱英回答说：“您安排我做郎中，楚王一旦去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后大笑道：“迂腐之见，我劝你放弃这种打算。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友好，他何必害我呢！”朱英知进言不被采纳，恐祸及自身，遂悄然离去。

此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棘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寿春城的南门即现今通淝门，李园养熟的刺客从两侧夹击，刺杀了春申君，斩下他的头颅，掷于棘门之外。与此同时，他立刻派遣官吏将春申君满门抄斩。骄傲自大的春申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听门客谏言，执意入棘门而被刺，身首异处，家破人亡，最终给后世留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警语和寿州内八景之一“门里人”石刻图像，

寓意“防人之心不可无”。

春申君黄歇“棘门之祸”是战国末期著名悲剧。他为何偏偏从南门进城，最终遭李园埋伏？假设当年他从别的城门进城，会不会避免此悲剧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追问当时的春申君住在哪里？这一问题，在寿县西南小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答案。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据史料记载，楚都寿春城建有金城与相国城，其中相国城即西南小城，相传为楚国令尹春申君所居。

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寿县文物保护单位对西南小城遗址展开系统调查与发掘。成果显示，该城平面大致呈圆角正方形，城内面积约10.4万平方米，包括护城河在内的整个城址面积约25.3万平方米。城墙以东墙和北墙保存最好，残存墙体宽约21.6~35.6米，残高超过2米，城外有护城河环绕一周，宽度四五十米不等。城河东北角通过人工河道与寿春城相连接，西南、东南角则与自然河道沟通，最终汇入淮河，水路格局清晰。

西南小城出土器物大多数是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其中的方格重三角槽形砖残件和米格纹方铺地砖残件，在柏家台高等级建筑基址也有“同款”。寿春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张义中表示，柏家台被认为是楚国晚期的宫殿基址，西南小城遗址也使用了大量的槽形砖、铺地砖、凤鸟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在2000多年前能够大规模使用如此精美的建筑构件，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该建筑的规模之大和等级之高。在1986年的首次调查时，时任考古领

队丁邦均先生根据采集到的遗物特征，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推测该城址为战国时期楚相春申君黄歇所居。

春申君从西南小城出发，前往位于寿春城中心的王宫，南门是距离最短、最顺直的进城路线，几乎是他每日通行的必经之路。正因如此，李园才将刺客埋伏于南门(棘门)之内，静待其入城。

千年之后，我从寿春城出发，沿着春申君回家的道路，驱车前往西南小城遗址实地探访。远远望去，一道土坎横亘于田野之间，明显高出两侧地面约1.5至2米——那便是残存的城墙了。

我登上城墙遗址，上面正是农民刚收割完的麦地，麦茬齐整，踩上去沙沙作响。自西向东行走，越往东行，墙底处越发显得高峻，地势明显抬升。城墙之上散落着几座土坟，荒草间隐约可见些许石块。城墙北侧，紧贴着墙脚，护城河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辨，如今已被改造成稻田，结合田里的水面，依稀可见当年护城河的轮廓。这一切虽历经两千余年风雨剥蚀，却仍能见其当年的规模，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大路上，遇见一位约莫七十出头的老农，便上前打听此地的名称。原来，这里我是在老家读书时常听人提及的古城村——距我老家不过三公里。多年来只闻其名，却始终不知其来历，今日方知脚下竟是春申君的故城所在。

大叔向我讲述，他小时候，四周城墙比现在高出许多，他常在上面放牛。城墙四角原有四个大土堆(我们当地人称之为“孤堆”)，1954年发洪水时，他家就住在东北角那个大孤堆上，水势滔滔，竟未能漫及。(我小时候也听长辈说过，1954年的洪水比1991年更为凶猛，

至今寿县东门城墙上还保留着两道水位标记线。)当年城墙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只是后来，村民们犁田耙地，起屋取土，城墙日渐削低，终于成了今天这道沉默的土坎。再往东修筑寿春路，西城城墙便彻底被压在路基之下，再无重见天日之时。不过，若从高空俯瞰，城墙与护城河的轮廓依然依稀可辨，宛若大地上一道淡淡的掌纹。

向大叔道别后，我独自站在寿春路上，远望那座曾经属于春申君的城池。遥想当年，这里该是何等壮观、何等富丽堂皇？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然而千年过后，宫室盛景早已荡然无存，现今城墙遗址上只有荒草、麦茬与土坟丘。此刻我想到李白诗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权势与功名，也如同这故城城墙一般，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淘洗。历史不能假设，春申君走南门，是由地理决定的“果”；而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骄傲自大，在于对局势的致命误判与对对手的轻敌。人哪座城门，从来不是关键所在。

千年过去，脚下的这片土地，春申君曾在这里筑城居位，如今又被乡人垦为良田，生长出岁岁不息的烟火谷物。曾经的权倾楚地，曾经的筹谋预判，终究因一念之差化作了棘门的血色警示，唯有那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警悟，顺着城壕的水流穿越千年，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给往来之人叩响长鸣的警钟。

空丘不语，残城留痕，只待每一个到访之人，在田埂土堆间，读懂历史翻卷下的世事与沧桑。

“蚌病成珠”与《淮南子》

高旭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第九季) 大型征文

“蚌病成珠”这一成语虽因定型于南朝梁时期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才略》一文而广为人知和运用，但其作为典故却是源出于《淮南子·说林训》。

《说林训》云：“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蚌”同“蚌”，指生活在淡水中的一种软体动物，介壳长圆形，黑褐色，壳内有珍珠层，有的可产出珍珠)意思是说：明月之珠，是蚌蛤的病害却是人的利益；虎爪象牙，是禽兽的利器却是人的祸害。《说林训》中还提及：“虻象之病，人之宝也；人之病，将有谁宝之者乎”；《说山训》亦有“明月之珠，出于蠃螟”(“螟”同“蠃”)之语。可见，关于“蚌病成珠”的现象及哲理，早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中已有深刻的认识，并作出了独到的思想诠释。

由于《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与《史通》《文史通义》一道被后世学者誉为“文史批评领域的三大名著”，故而“蚌病成珠”这一成语在历代文学家使用中常用以比喻和慨叹因不得志而写出好文章的特殊情形。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即云：“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壤盛世，《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东汉冯衍(字敬通)，虽逢政治安定之世，自身才学出众，可仕途困顿，屡遭排挤，终身沉沦下僚，郁悒难申其志，但政治上的匮乏坎坷，反而激发其写出了《志》《自序》等佳作，恰如蚌蛤因沙粒侵入患病，反而孕育出稀世明珠。在刘勰看来，冯衍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与《文心雕龙》不同，若就“蚌病成珠”典出于《淮南子》的特定语境来说，其思想内涵则要更加丰富隽永，非仅能适用于文章写作方面，而是在事关人生发展得失的诸多方面皆可有所运用。为何如此呢？可见《淮南子》论及“蚌病成珠”之时，体现出了远较《文心雕龙》深邃的道家辩证思维及哲学智慧。

其一，《淮南子》是从“利”“害”之辨着眼，来看待“蚌病成珠”这一自然界的特殊事件。其所言“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明确指出了“病”与“利”、“利”与“害”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赋予了“明月之珠”“虎爪象牙”以特定的人文思想意蕴，揭示出二者背后所隐含的道家哲理，即看待“病”与“利”需用辩证之眼光，而非仅就“病”论“病”，就“利”谈“利”。《淮南子》提醒人们需注意到：所谓“病”与“利”只是事物发展情况的一面，其后的潜藏着“利”与“害”的另一面，因此看待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要能兼顾正、反两个方面来审视，方可避免片面化的认识，求得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淮南子》围绕“明月之珠”“虎爪象牙”而阐明的“利”“害”之辨，其理论实质即是基于辩证思维的道家“利害观”，故此《淮南子》视界中的“蚌病成珠”体现出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所蕴道家意涵要优于《文心雕龙》，更能散发出道家哲学之隽味，令人深思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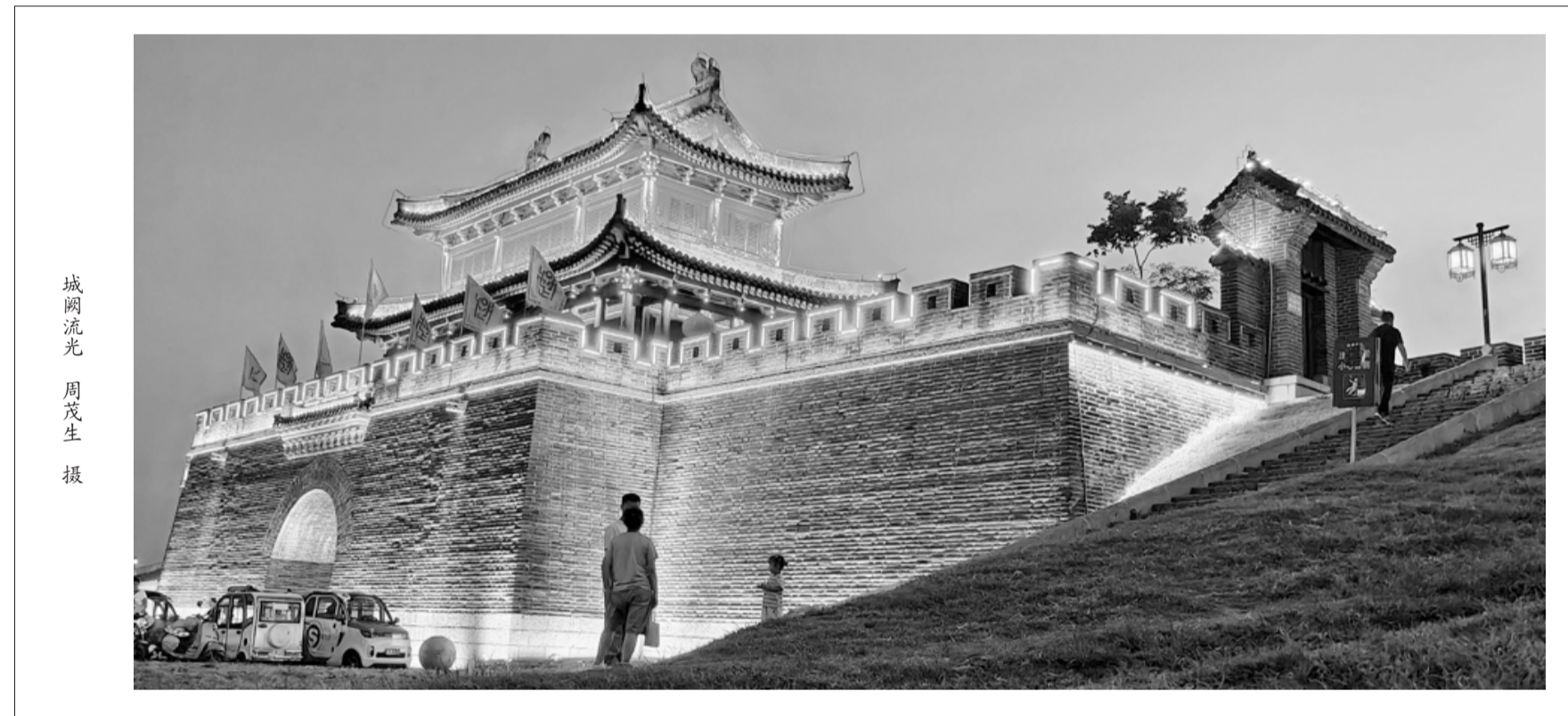
其二，《淮南子》亦从“人”与“禽兽”之关系着眼，来反思“蚌病成

珠”所具有的社会性意蕴。“蚌之病而我之利”“禽兽之利而我之害”，尽管人类与“禽兽”共存于自然界之中，但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界，因而“禽兽”之“病”或“利”，可能却是“人”之“利”或“害”。《淮南子》谈及“明月之珠”“虎爪象牙”不单单只是站在人类发展的立场看问题，而是也兼顾了自然界之“禽兽”的视角，这是一种“双向”观照的理论视野，其间反映出中国古代道家独有的“万物一齐”“道法自然”的哲学深蕴。在某种意义上，《淮南子》借助“蚌病成珠”这一典故，告诫人们不应固守单向度的“人”之视角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而是应兼观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存在发展情况来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社会发展问题，以此减少或避免片面化的思维弊端，最大程度上实现“人”与“禽兽”之间的和谐共存。就此来说，《淮南子》所论“蚌病成珠”一事，亦带有一定的动物伦理哲学意味，这对破除人们惯常固有的以“我”为本、压倒一切的“人类中心”思维，不无启迪镜鉴之益。

其三，《淮南子》还从“珠”“病”之关系着眼，来揭示事物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得”“失”变化规律。对于“蚌”来说，“明月之珠”的获得，来自于泥沙之侵害，并非得益之事，只是无可奈何而已。因此，叹曰“珠”乃是“蚌”之“病”与“失”的结果，符合有“失”有“得”的天道自然规律。这一至理若推之人事，亦复如此。《淮南子·人间训》曾言及的“塞翁失马”故事，便与《说林训》所说“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在“得”“失”之理上相类，只不过前者说的是“马无故亡而入胡”之“失”，却带来了“将胡骏马而归”之“得”。对“马”而言，有“失”而有“得”，但由此也给塞翁之家造成了先有“失”后有“得”，有“得”之后又有有所“失”的莫测变化。在《淮南子》看来，不论是“蚌病成珠”，还是“塞翁失马”，都逃不出事物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得”“失”变化规律。也因此，《淮南子·览冥训》云：“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以辩说也。”而《淮南子·人间训》则在“得失观”的基础上论曰：“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用“祸福观”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得”“失”之变化的哲理思考。《淮南子》此种对“得”“失”变化规律的重视与揭橥，不可不谓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洞见和人生智慧。

由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蚌病成珠”这一典故源出于《淮南子·说林训》绝非偶然，而是深受中国古代道家辩证思维及哲学思想浸染与作用后形成的文化结晶，其所蕴的哲理智慧远非文章之事所能局限，而是可以在更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中得到验证。也缘此，千载之下，重新品读《淮南子》对“蚌病成珠”的道家化的思想诠释，或许能让我们对“得”“失”、“利”“害”问题有所更深入的思考和觉解，进而或许还能促使我们转变原有的片面化的思维方式，从受困于或“得”或“失”的执着妄念中超脱出来，走向看淡“得”“失”的人生豁达，最终实现内心的从容、平和与豁达。

真正的“明月之珠”，就在所有懂得“蚌病成珠”之至理的人的心中……既然内心自可得“珠”，那我们又何必外求！



城阙流光 周茂生 摄

淮水汤汤，流淌千年。明月皎皎，光照万载。丙午年的中秋之月，稳稳扑进淮南的怀抱。

月洒淮河，辉从河面吹来，流金溢彩，润泽江淮，辉映寿春。天地为舞台，楚汉蕴风雅。灯火里的淮水之畔，文脉绵延，乡情愈浓。

逾七公里的古城墙，每块夯实的青砖都接受着月光的抚慰。城是圆的，水绕着城走。瓮城的缺口兜住风，兜住清柔的月光。老人们说，寿春城是块浸了千年淮水的灵玉，月光一照，就映出中秋最妥帖的圆。而城墙上青青苔迹里，还藏着旧年的花香。月上树梢，人们倚墙仰望，仿佛风里飘的也是同一种甜、同一种情。

往南走是舜耕山。石阶上印刻着上古的耕痕。桂树积攒了整夏的香，风掠过便弥漫了整座山。黄昏，行人沿着步道走，衣襟沾着细碎的花瓣；手里拎着刚从巷口称的五仁月饼，糖霜蹭在指尖唇畔，甜得像儿时攥着半块月饼看月亮

淮水悠悠流淌千年，横亘在南北地理与文明的分界线上，孕育出底蕴深厚的淮河文化。如今它已是安徽五大核心文化标识之一，深深扎根于淮上大地，将古淮南与现代淮南的岁月风华紧紧相连。南北风物在此交汇，四方文明在此相融，时光淬炼之下，这份文脉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最深的精神根脉。

想要读懂这片土地，先要厘清“淮上”与“淮南”背后的岁月深意。淮上指淮河两岸的辽阔原野，自古便是扼守南北的咽喉要地；淮甸是依河而生的平原沃野，处处弥漫着田园农耕的烟火气息。从秦汉淮南国，到唐宋淮南路；从古寿春故城，到如今的淮南城邑，两地山水相依、文脉相连，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从未因世事变迁而中断。

漫步淮上大地，随处都能触摸到文明初兴的印记。八公山出土的“淮南虫”化石，距今已有八亿年，是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的珍贵见证，也为这片土地埋下了生生不息的生机。七千三百年的双

散文

淮水月圆

陈琦

爬上来的夜晚。山不高，抬眼便能看到月亮从松枝后探出脸庞，像几千年前舜帝在此歇脚时，随手挂在树上的银盘，亮得温润，圆得柔和……

西行，焦岗湖的芦苇已经抽了白穗。水鸟擦着湖面飞过，翅膀沾了月光，落入苇丛，惊起满湖碎星。采莲的船早已归岸，只剩半湖残荷举着清露。清风扫过，露水滴进水里，漾开的水波将淡淡的月影揉成摇曳的银片。岸边的渔翁收了网，竹匾里的银鱼泛着粼粼白光。

两千年前的风，拂过八公山，林涛阵阵。月下，刘安与八位门客围坐石案，执笔著简，第一次系统梳理、记载二十四节气。嫦娥奔月的传说，顺着淮水吟唱了千年。他们不曾想到，两千年后，名为“嫦娥”的探测器真的落在月面，把华夏儿女的浪漫与楚风汉韵的文脉，从

散文

淮水汤汤 文脉绵长

程晋仑

墩刻符，落笔之间藏着先民的巧思与智慧，是探寻汉字源头的重要实物，也实实在在地证明，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寿县芍陂静静伫立两千六百余年，修建年代早于都江堰，古人顺势而为、顺应自然的治水理念，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这座被誉为“天下第一塘”的水利工程，更是享誉世界的灌溉遗产。

岁月更迭，文脉一路绵延。先秦时期，淮夷部族在此安居劳作，孕育出淳朴厚重的本土文明；战国末年，寿春成为楚国都城，宏大的城垣、出土无数珍贵的武王墩楚墓，尽显展现着楚文化的瑰丽绚烂。到了西汉，淮南国定都寿春，刘安广纳四方贤士，合力编撰《淮南

子》这部典籍兼收诸子思想，囊括天文地理、神话民俗、百工技艺，筑起一座不朽的思想高峰。淮水之战的烽烟早已散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故事却代代相传。这场经典战事推动了南北文化深度交融，也让这片土地养成了刚柔并济的精神气质。

千年岁月浸润，淮河文化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崇务实的品格。这里既有中原礼乐的端方大气，又有楚地风情的浪漫灵动，兼得吴越文化的温婉雅致。先民们兴修水利，踏实耕耘，尽显实干担当；文人贤士潜心求索，著书立说，满足求知向学的热忱。与文风内敛、重宗族南道的徽州文化，以及依江而立、开明求新的皖江文化相比，淮河文

化以南北交融为底色，以思想创造为亮点，在安徽文化版图里独树一帜。文脉兴盛，地方方能行稳致远。守护好这份千年文化，让古老文脉在当下重焕光彩，是我们肩头的时代责任。整理古籍文献，守护历史遗迹，把文化根基扎得更牢；深挖本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名片，让《淮南子》、淝水旧事、安丰塘风韵走出历史，走进寻常生活。同时携手沿淮各地并肩前行，打破地域隔阂，同心共建淮河文化共同体。

淮水滔滔，奔涌千年不曾停歇；文脉昭昭，历经风雨愈发璀璨。从亿万年前生命萌芽，到百家学说荟萃一堂；从金戈铁马的过往，到安居乐业的今朝，淮河文化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站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守好文化之根，传承先贤智慧，奋力书写崭新篇章。相信这条流淌着千年文明的淮河，终将载着世代人的憧憬与理想，让淮上淮南的绝代风华，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久久传扬，绽放恒久光彩。



岁月 张莉莉 摄